



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 三次献俘行迹考略

——从故宫博物院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说起

任 昉

内容提要 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不论是对当时朝廷还是对王守仁本人，都是一件大事。然而关于王守仁的献俘行迹，史载却颇多错乱。故宫博物院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长卷，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对于考证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三月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后的三次献俘行迹与艰难处境有很大帮助，对于了解王守仁遭遇政坛险恶与人生坎坷的复杂心理也有很大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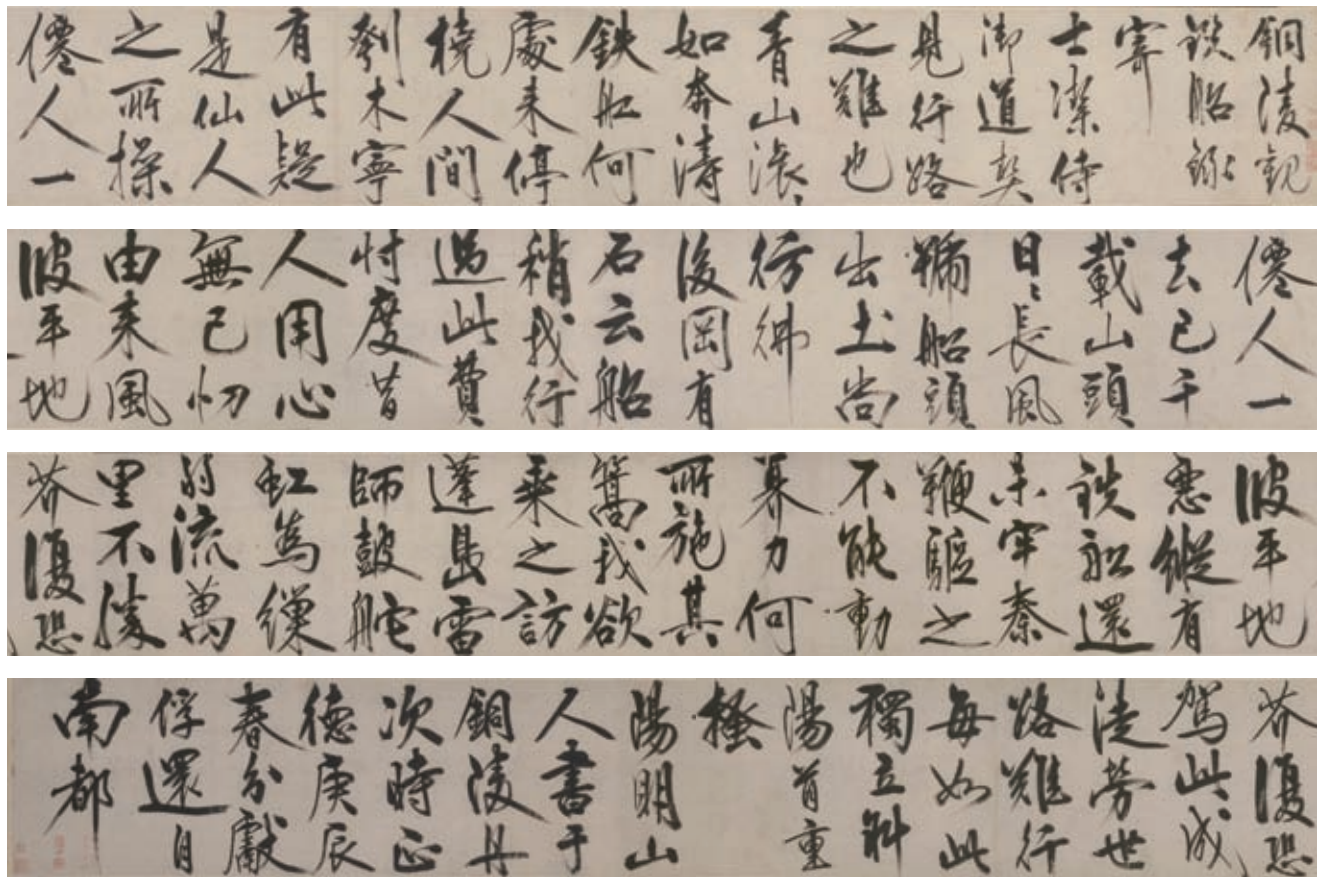
关键词 王守仁 平定宁王宸濠叛乱 三次献俘 铜陵观铁船歌 行迹

王守仁(1472~1528)，初名云，五岁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初授刑部主事，转兵部主事。武宗正德元年(1506)，因得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瑾诛，量移庐陵知县。历任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太仆少卿、鸿胪卿。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昌)、赣(州)。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反叛。七月，以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州)、漳(州)军务，主持平定宸濠叛乱，并生擒宸濠本人。九月，囚送宸濠至钱塘，献俘于太监张永。不久迁巡抚江西，世宗即位(1521)封新建伯。此后又历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等。卒谥文成。有《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传世^{〔1〕}。王守仁作为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可谓人所熟知。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不论是对当时朝廷还是对王守仁本人，也都是一件大事。然而关于王守仁的献俘行迹，史载却颇多矛盾错乱。故宫博物院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长卷，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对于考证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后的三次献俘行迹与艰难处境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了

〔1〕 王守仁：《王文成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下引本书，不再注明)。



〔图一〕王守仁《铜陵观铁船歌》卷 纵31.5厘米 横771.8厘米



解王守仁遭遇政坛险恶与人生坎坷的复杂心理也有很大的裨益。

《铜陵观铁船歌》为纸本长卷，行书，纵31.5厘米，横771.8厘米，分为歌序、歌词、署款三部分，兹分别将图〔图一〕、文逐录如下：

铜陵观铁船，录寄士洁侍御道契，见行路之难也。

青山滚滚如奔涛，铁船何处来停桡。人间剡木宁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载，山头日日长风号。船头出土尚仿佛，后冈有石云船稍。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人用心无已切。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秦鞭驱之不能动，累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鼓舵虹为纜。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

阳明山人书于铜陵舟次，时正德庚辰春分（1520），献俘还自南都。

署款下钤“阳明山人王伯安印”一方，还钤有“林口周印”、“杜是鉴藏书画之印”、“杜是收藏书画”、



“星衍”、“伯渊审定真迹”等多方鉴藏印¹³。

按：这首《铜陵观铁船歌》，《王文成全书》卷二〇《外集二·诗》虽然亦曾收录，但有歌序、歌词，无署款。歌序作：“舟过铜陵，野云县东小山有铁船，因往观之，果见其仿佛，因题石上。”与长卷歌序亦大不相同。歌词仅“昔人用心无已切”之“已”作“乃”，其余全同。推测长卷系当时为“录寄士洁侍御道契”所写，《王文成全书》收录的《铜陵观铁船歌》则系后来编文集时所改定，时间不同，背景不同，心情不同，详略增删当然也不同。就此而言，长卷作为原始的作品，更加值得珍贵。

长卷歌序“录寄士洁侍御道契”中的“士洁”，推测应是御史谢源。因为此人时官“侍御”，也就是御史；与王守仁为“道契”，也就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御史谢源之名，屡见于《王文成全书》。如该书卷三一《开报征藩功次赃仗咨》云：“（讨伐宁王宸濠之役）适遇巡按两广御史谢源、伍希儒回京复命，又行具本奏，留军前协谋行事，各哨官兵俱听监督。……各哨擒斩贼犯，送发御史谢源、伍希儒审验明白，从实直纪。”²《万姓统谱》卷一〇五谢源条云：“源字洁甫，闽县人，弘治进士，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以直言，正德十六年（1521）秋，谪判秦州。先是按治广东，发摘奸伏，群吏畏服，竣事，经江西时，宁贼窜逸，同都御史王公守仁追劾守臣，帅兵讨之，俘斩千余众，还所掠百余人，其功尤伟。”事迹相同，惟字“洁甫”，与“士洁”有一字之差。但夏良胜《东洲初稿》卷一三《柬谢士洁道长》云：“庐陵故名邑，而阳明公暨吾兄先后宰治，政望蔚然；兹又巧值义旅，并懋殊勋……在阳明籍劳，在吾兄纪验。”知此谢士洁与王守仁先后均曾任庐陵知县，并同预讨伐宁王宸濠之役且各有分工。谢源与王守仁同预讨伐宁王宸濠之役且各有分工，前面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证。据《江西通志》卷一九《公署一》庐陵县署条云：“正德五年（1510）圯，知县王守仁修葺，记石阴；十一年（1516），知县谢源于川堂后新作阳明堂，王懋中撰记。”知与王守仁先后任庐陵知县的就是谢源。因而长卷歌序中的“士洁”即谢源殆无疑问。

长卷署款，人、时、地、事俱全，十分重要。人是“阳明山人”，也就是王守仁本人。时是“正德庚辰春分”，也就是正德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³。地是“铜陵舟次”，也就是在铜陵（今安徽铜陵县）西边长江客船之上。事是“献俘还自南都”，也就是从南京献俘归来。其中，惟事似乎不太准确。因为如

〈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代书法》，页169-175，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1年12月。按：本书著录该卷存在三处错误：①解说称该卷是“王守仁在铜陵献俘回到南都时所作”，实则应为至南都献俘回经铜陵时所作。②释文“录寄士洁侍御道，契见行路之难也”，“道契”为成语，指同修道义的至交，不应断开。③释文“昔人用心无已切”，“已”为“巳”之误，“无已”为成语，指无止境、不得已。另参本文。

〈2〉 浙江温州市博物馆还藏有一件由王守仁五通手札合裱的《致谢源书》长卷。参阅：高启新《罕见的王守仁手札长卷》，《温州日报》2010年7月24日；同作者《明王守仁〈致谢源书〉》，《联谊报》2010年8月5日。

〈3〉 一般而言，二十四节气的前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分别在阳历的2月3至5日、2月19日前后、3月5至7日、3月20或21日。但正德十五年闰八月，使阳历时间也有所提前。《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二正德十五年正月庚寅朔，云：“丁酉立春。”丁酉为正月八日，亦即阳历1月27日，是日立春，较正常立春时间提前了一周。据此推算，春分应为二月二十三日前后，亦即阳历3月13日前后，也较正常春分时间提前一周左右。张培瑜定是年春分为二月二十四日癸未，见《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页349，大象出版社，1997年，与本文推算相当。



前所说，正德十四年九月，王守仁已囚送宸濠至钱塘，献俘于太监张永。事情过去将近半年，王守仁还要在长卷署款上特别注明是“献俘还自南都”，应该另有深意。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涉及，这里暂且省略。

关于宁王宸濠反叛被擒杀经过和武宗此后一年多的行迹，《明史·武宗纪》等书记载如下：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宁王宸濠反于南昌；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七月甲辰，武宗宣布御驾亲征（实际是想借此南下玩乐）。丙午，宸濠犯安庆，不利。辛亥，王守仁帅兵收复南昌，宸濠大恐，从安庆还。丁巳，守仁败宸濠于樵舍（今江西新建县西北），擒之。八月癸未，武宗发京师；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发（希望能够继续南下玩乐）。十二月辛酉，次扬州；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正德十五年正月至闰八月前，武宗大致都在南京及其周边活动。闰八月癸巳，武宗命于南京广场当众释宸濠等，又伐鼓鸣金而擒之，以示为自己所亲俘。丁酉，武宗发南京；癸卯，次镇江。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十月庚戌，次通州。十二月己丑，杀宸濠等；甲午，始还京师。据此可知：宸濠自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举事，至七月丁巳战败被擒，仅四十有二日。武宗系在宸濠战败被擒后的八月癸未以御驾亲征为名离开北京的，十二月丙戌到达南京，正德十五年闰八月丁酉离开南京，十二月甲午回到北京，在外逗留约一年五个月（含一个闰月）时间。

而王守仁自正德十四年七月战擒宁王宸濠之后，直至正德十五年三月以前，就一直遭受太监张忠和倖佞许泰、江彬、祝续、章纶等的逼迫和陷害，情况可谓危乎殆哉。据《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记载：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抵南昌。诸嬖幸故与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覬觐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媚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竟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今江西上饶县）。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东），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塘（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遇太监张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嫚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



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离家久，闻之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谗毁百端，独永时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镇，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

按：这些记载，没有提到铜陵，且都无明确时间。仅知守仁既为了不让这些太监和倖佞抢功及毁灭私通罪证，也为了能够借“献俘”晋謁武宗为自己表白，并为“从征官属”请功（见后文），曾带着宸濠等逆犯东躲西藏。先从玉山入浙，欲绕道北上，向武宗当面“献俘”，被武宗拒绝。到了钱塘，不得已，将宸濠等逆犯交给太监张永。但心犹未甘，又北至京口，欲从此（武宗到南京必经京口）再北上拦截晋謁。然而诏命巡抚江西，只得返回南昌。后奉武宗圣旨，至南京晋謁，又遭张忠、许泰阻扰未果。此次打击甚大，因而去了九华山，晏坐僧寺寻求慰抚。直到武宗完全释疑，命他还镇，更上捷音，他才重回南昌。他在新上的捷音中，将平定宸濠叛乱的功劳归于武宗，并与这些太监和倖佞妥协，违心地对他们进行了表彰。其中，关于王守仁的行迹，虽然没有提到铜陵，但提到了铜陵南边百余里的九华山。可以推测：王守仁是在至南京晋謁未果，专程前往九华山散心的。但《铜陵观铁船歌》是否此次所写，并不清楚。

据《王文成全书》卷三三《附录二·年谱二》的记载，将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三月间的王守仁行迹摘要（正文大字，注文小字）逡录如下：

（正德）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岁，在江西

九月壬寅，献俘钱塘，以病留。九月十一日，先生献俘，发南昌。（张）忠、（许）泰等欲追还之，议将纵之鄱湖，俟武宗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连遣人追至广信。先生不听，乘夜过玉山、草萍驿，张永候于杭，……（先生）以（宸）濠付之，称病西湖净慈寺。

奉敕兼巡抚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先生称病，欲坚卧不出，闻武宗南巡，已至淮扬（治今江苏淮安市），群奸在侧，人情汹汹，不得已从京口将径趋行在，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会奉旨兼巡抚江西，遂从湖口（今江西鄱阳湖口）还。



（正德）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岁，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芜湖，寻得旨返江西。（张）忠、（许）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适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屡矫伪命，先生不赴，至是（张）永有幕士顺天检校钱秉直急遣报，故得实。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今江苏江宁县西北），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汨汨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以晦日（三十日）重过开先寺（在庐山双剑峰下，传为梁昭明太子栖隐之地），留石刻读书台（在开先寺内，为南唐中主李璟读书处）后，词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明日游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下），徘徊久之，多所题识。

二月如九江。先生以车驾未还京，心怀忧惶，是月出，观兵九江，因游东林（寺名，在庐山西北麓）、天池（有大、小天池，大天池在庐山天池山，小天池在庐山牯岭东北不远）、讲经台（在庐山香炉峰西南）诸处。

是月还南昌。（此后未再记出江西献俘事）

按：这些记载，也没有提到铜陵，且矛盾错乱之处甚多^①。譬如正德十四年正文九月与十一月间已记王守仁“奉敕兼巡抚江西”，又在“十一月返江西”下注“会奉旨兼巡抚江西”。又譬如正德十五年正月正文说王守仁“赴召，次芜湖”，注文前面也说张忠等“复拒之芜湖半月”，但注文后面突然又说“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为诸幸谗阻，不得见”。编者似乎不知上新河与南京近在咫尺，距芜湖则将近二百里，二者应该不是一回事。还有一些，此不赘举。我以为：王守仁以“献俘”为由，出南昌北上，寻求晋谒武宗机会，先后共有三次。途经地点，除第一次绕道北上外，全在长江南岸和鄱阳湖边，可以推测，往返均走长江和鄱阳湖的水路。近年朱思维先生撰《王阳明巡抚南赣和江西纪

① 按：较此更为矛盾错乱的是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该书卷四七“宸濠之叛”条记有两次献俘，均系于正德十四年九月。第一次称王守仁在钱塘“以（宸）濠付之（张）永”，乘夜渡浙江过越还江西”。似乎完全没有守仁稍后由钱塘赴京口事。第二次称“张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无君可知。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龙江，将进见，忠殊失意，又从中阻之，守仁乃纶巾野服入九华山”。前面已说守仁当夜由钱塘“还江西”，这里又借张忠口说守仁仍然“在杭”。矛盾错乱，一至如此。又，龙江，关名，在今江苏南京西之下关港附近，与《年谱》所说之“上新河”实为同一地点。下文另有解说，可参阅。



事》^①，根据相关诗文及碑刻，对王守仁巡抚南、赣及江西之事进行了编年及考证，并对前揭王守仁年谱的错误进行了订正，虽因未见本文所揭故宫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长卷，存在一点缺漏和问题，但所述大致可信，与我的见解也颇多相同。这里综合王守仁年谱、朱先生大著及我的见解，分述如下：

第一次：正德十四年九月十一日，首出南昌。此次为了躲避张忠、许泰等人，特别从玉山入浙北上，上书请献俘，欲止帝南征，帝不许。十月到达钱塘（守仁《宿净寺四首》诗序称“十月至杭”），不得已，将宸濠等逆犯移交太监张永。此次对王守仁打击较大。因为战擒宁王宸濠，不仅无功，而且有过。“从征官属”出生入死，也未获任何封赏^②。守仁心中不平，故在西湖净慈寺称病。同月稍后，北赴京口，又至金山寺散心（守仁有《泊金山寺》、《金山赠野闲钦上人》等诗）。十一月，闻武宗南巡，已至淮扬，欲从京口北上拦截晋谒。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此时适奉诏命巡抚江西，不得已，由京口乘船沿江西上，经湖口入鄱阳湖，大约于十二月初返回南昌。

第二次：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得旨解送其他囚犯至南京，遂再出南昌。此次乘船经鄱阳湖入长江，行至芜湖，复遭太监张忠、许泰等阻拒，令速回江西安抚军民（守仁《又与克彰太叔》书称：“正月二十六日得旨，令守仁与总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至芜湖，复得旨回江西抚定军民。”）。此次对王守仁打击更大。前引《明史》本传称武宗“乃遣（守仁）还镇，令更上捷音”，应该系于此次。据返回途中，经过庐山，于同月晦日，亦即三十日，重游开先寺，在寺内读书台后留下石刻，称：“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推测守仁已经决定按照武宗旨意，重上捷音，将功劳归于武宗了。但从仍“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来看，守仁对“从征官属”未获封赏还是耿耿于怀的（按：此石刻今存，名《平宸濠碑》，在江西星子县南康镇秀峰寺内）。次日，也就是二月一日，再游白鹿洞，徘徊久之，也留下一些题识。回到南昌，应该是二月四、五日了。

第三次：正德十五年二月上旬，也就是刚回南昌没几天，又奉太监张永幕士钱秉急报，以为武宗愿意接见，遂三出南昌。由于是张永私人加急密报，不便张扬，遂以“观兵九江”为名。此次仍乘船经鄱阳湖入长江，行至上新河，也就是龙江，又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上新河、龙江与南京近在咫尺，长卷署款称“献俘还自南都”，应是指此而言。此次对王守仁打击最大，故中夜在江边默坐，有求死、遁世之心。也就是此次，由上新河、龙江沿原路返回，经过铜陵，已是同月下旬春分（二十四日），写下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署款仍称“献俘”，还是暗含为自己也为“从征官属”表功之意。此后去了一趟九华山，晏坐僧寺寻求慰抚，并与周经和尚谈偈，一直逗留到三月八日后（守仁《题周经和尚偈》署款称：“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三月十日，返程

① 朱思维：《王阳明巡抚南赣和江西纪事》，《王阳明巡抚南赣和江西》，页149—240，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② 按：《明史》卷一九七《黄绾传》云：“王守仁中忌者，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多以考察黜。绾讼之于朝，且请召守仁辅政。守仁得给赐如制，珣等亦叙禄。”据同书《世宗纪》，王守仁获封新建伯，在世宗即位之初，则“从征官属”获得封赏，更在其后。



经游齐山(守仁《春日游齐山用杜牧之韵二首》署款记时间为“清明”，即三月十日^①)。然后应在贵池重新上船(齐山靠近贵池)。三月十九日，经湖口至石钟山，作《献俘南都回还登石钟山次深字韵》诗(今石钟山仍存守仁题名，称“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阳明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登此”。“丁未”为十九日)，仍念念不忘此行是“献俘”。此后重游庐山。前揭王守仁年谱原系于二月的“因游东林、天池、讲经台诸处”，均应系于此时。三月末返回南昌。如果没有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没有“阳明山人书于铜陵舟次，时正德庚辰春分，献俘还自南都”的署款，我们恐怕很难将王守仁第三次献俘行动完全联系起来。

据《大清一统志》卷八二《池州府·山川》记载：“铁船山在铜陵县南五里。《名胜志》：山首尾皆生铁，其形如船。”又《江南通志》卷三四《舆地志·古迹五》记载：“铁船在铜陵县五松山前湖田之下，首尾船形，如积铁。旧传晋浔阳太守张宽歿，为神于此，一夕乘船至，为人所见，其船遂溺，而露首尾焉。”可知铜陵铁船的历史十分悠久。王守仁在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三月间，三出南昌，往返五次经过铜陵铁船，仅在最后一次写下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自是有感而发。前面已经说过，此次出南昌，欲晋谒武宗，又为诸幸谗阻，不得见，对王守仁打击最大。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共二十句，开头从“青山滚滚如奔涛”至“后冈有石云船稍”八句，为一般铺陈。接下来，从“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人用心无已切”开始，切入正题。此二句意思是说：我途经铁船，费力的揣测，昔人用心造此，应该是有不得已的担忧吧。担忧什么呢？因为“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但即使铁船很牢，甚至“秦鞭驱之不能动^②，昇力何所施其篙”，也恐怕没有用。因为我要访问的地方，太过遥远。如此引出下四句：“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鼓舵虹为纜。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因为我要乘此铁船访问的地方是蓬岛。蓬岛即远在东海之上蓬莱仙岛，这里借指武宗的皇宫。乘此铁船访问这么遥远的地方，即使是请雷神掌舵，用彩虹作缆绳，也恐怕就像细弱的溪流，流经万里，终会枯竭，连细微的芥子也浮托不起一样，终究仍是白忙一场。至此点题：“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并与长卷歌序所说“见行路之难也”呼应。王守仁三次希望晋谒武宗，三次都沮丧而归，怎不慨叹人生行路之难？最后只能孤独地站在斜阳之下，面对千年铁船，不断地搔首沉思。歌词内容与作者此时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理，可谓若合符契。王守仁“心学”之形成与深化，与这段时间的遭遇应有密切关系，应该引起研究王守仁“心学”的学者的重视^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张 露)

① 前揭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页349。

② “秦鞭”见《艺文类聚》卷七九《灵异部下》引《三齐略记》：“(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于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城阳一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似相随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尽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

③ 参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页205，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日]岛田虔次(邓红译)：《中国思想史研究》，页72—8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